

宋代诗经学

研究

谭德兴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宋代诗经学

研究

谭德兴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诗经学研究/谭德兴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21-06915-8

I. 宋... II. 谭... III. 诗经—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937 号

宋代诗经学研究
谭德兴 著

责任编辑 孟筑敏
封面设计 张彪
版式设计 祖铭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50 千
印 张 1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6915-8/I·1425
定 价 22.00 元

序

曹顺庆

谭德兴著《宋代诗经学研究》一书，分析了宋代《诗经》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与基本特点。全书紧紧抓住了宋代《诗经》学发展的两条基本线索而展开。一是宋代《诗》学理学化的问题，这是宋代《诗》学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宋代《诗经》研究能成为宋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该书以二程、朱熹以及王柏等为例，分析了宋代《诗》学家是如何从《诗》中发掘出理学范畴与思想的。其中对二程、王质和朱熹《诗》学心理分析的研究较富创新性。著者通过分析研究宋代《诗》学中大量的女性心理以及宋代“淫诗”说的有关问题，揭示出宋代《诗》学理学化的目的与内涵。另一条基本线索则是宋代《诗》学文学化的问题。《诗》学文学化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以诗看《诗》和文学文论的《诗》学化倾向。著者对宋代《诗》学以诗看《诗》的分析是深入透彻的，全书从诗歌发生论、文体论、情感论以及艺术手法论等多方面揭示了宋代以诗看《诗》的丰富内涵。该书对宋代《诗》学与辞赋批评的关系研究，以及宋代《诗》学与诗话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也都新见迭出，而该书对理学家以诗看《诗》的分析更是新颖独特。这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原受理学家对诗歌的文学本质还是有深刻思考的，并非如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根本不懂诗歌的文艺特质。该书对南宋后期《诗》

学文学化动因的分析较具独创性,所发掘的宋代《诗》学文学化内容以及宋代文学《诗》学化内涵,对重新认识和编写中国文学或文论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诗经学研究》,重点研究的是宋学《诗》学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基本特征,其中主要揭示了有别于汉唐《诗》学体系的崭新内容。本书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诗》学对宋代文化发展产生过巨大作用,该书对经学与文学互动关系的研究,是本书的主要创新点之一。经学与文学关系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研究的意义自无需多说。本书从经学与文学关系视角切入,深入探讨了宋代《诗》学文学化与文学《诗》学化的问题,从宋代《诗经》学著述中发掘出大量文学思想以及文学批评的材料。以往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多注重从文学创作本身以及文论材料中发掘内涵,很少从经学研究著作中来分析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本书的研究,丰富了宋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内容,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到文学的发展对经典阐释学的内在影响,以及经学在范畴、理论等方面是如何在文学发展中的转换问题。

本书的研究让人们认识到,文学的发展动力不仅来源于文学自身以及政治、经济原因,还得从经学中寻找原因。宋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就是从《诗》学中寻找话语与思想的,若没有深厚的经学底蕴,是难以形成宋代文学以及文论繁荣的局面的。文学与经学实现互动,是中国古代文学在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土壤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其中最为特殊的莫过于文学与经学的密切关系。经学是中国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源,其自形成体系后便一直伴随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那么,经学与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传统的观点认为,经学与文学是一种对立的关系,经学的发展肯定会阻碍和限制文学的发展。但历史事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却往往同时也是经学家。经学家与文学家二者的身份又是怎样在这些人的身上实现有机统一的呢?为什么经学在

这些人的身上却没有成为一种束缚呢？当其以文学家身份诠释经典时或者以经学家身份从事文学创作时，又是怎样实现身份的转换的呢？显然，这些问题在我们以前的文学史写作或经学史研究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实际上，从源头上来说，经学与文学二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这是因为，首先，经学与文学有同一个发生之源，二者皆源于“人文”。仓颉造字、伏羲画卦是古人所认为的最早的“人文”发生，可这既是经学的源头也是文学的源头。《文心雕龙》的《原道》、《宗经》等篇实际上就阐明了这个问题。文字和象既是经学家研究的东西，也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赖以生存的基本内核。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易》、《书》、《诗》、《骚》等全部串在“人文”的发展线索上，事实上这已经将经学与文学视为同源。而之前的《汉书·艺文志》也是把《诗》与楚辞、汉赋以及乐府等串在一条线上来审视的，显然并没有想刻意划分出经学与文学的界限。其次，经学著作与文学著作实际上是可以互为转换的。一部书到底属于经学范畴还是文学范畴，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一部书的性质有时是截然不同的。例如，《诗》在先秦时期，往往被当做培养人才和进行交际的工具，而到了汉代，则上升到治国理政的纲纪，到了现代，则又变成只是一部文学性质的歌谣集。又如，《离骚》在西汉时期只不过是受到大量模拟的一篇文学作品，可到了东汉王逸手里，则被视为经典，而宋代朱熹更是口口声声以“《离骚》经”称之。再如，《左传》在先秦两汉时期只是传而非经，可到了唐代则上升为经典，而当代文学史则又将之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和研究。因此，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一部书是属于经学范畴还是文学范畴，这似乎很难得出绝对的答案。一部书的性质只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视角而已，这种认识显然只是相对的，这似乎也很难说哪一个时期人们的认识是对或错。以古律今或以今律古似乎都欠公允。

谭德兴君的这部著作,对上述问题都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堪称《诗经》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可喜可贺。是为序。

2005 年春于四川大学

目 录

(4)	第一章 绪言	
	一 《诗》学理学化 (6)	
	二 《诗》学与文学互动 (8)	
	三 《诗》学与政治互动 (11)	
	四 关于汉学与宋学之争 (14)	
(18)	第二章 宋代学风与《诗》学发展	
	一 北宋初期经学观的转变与《诗》学发展 (18)	
	二 庆历新风与《诗》学发展 (31)	
	三 熙宁新学与《诗》学发展 (47)	
	四 疑古惑经与《诗序》辨说 (58)	
(75)	第三章 宋代《诗》学范畴论	
	一 本末论 (75)	
	二 正变论 (87)	
	三 六义论 (99)	
	四 情性论 (115)	

-
- (131) **第四章 欧阳修的《诗》学思想**
- 一 据文求义 (131)
 - 二 以情论诗 (133)
 - 三 比兴新论 (137)
 - 四 叙事研究 (140)
- (143) **第五章 程颢程颐的《诗》学思想**
- 一 摆落汉唐 独研义理 (143)
 - 二 《诗》分六义 以“兴”为重 (148)
 - 三 性其情与情其性 (156)
 - 四 以“诚意”论《诗》的特殊情怀 (164)
- (168) **第六章 王质的《诗》学思想**
- 一 先绎本文 徐及他载 (169)
 - 二 以乐论《诗》 (172)
 - 三 注重心理分析 (177)
 - 四 诗歌发生研究 (187)
 - 五 以诗歌注《诗》 (193)
 - 六 《诗》论的文学批评化 (195)
- (201) **第七章 朱熹的《诗》学思想**
- 一 《诗》学理学化 (201)
 - 二 “淫诗”说的双重内涵 (206)
 - 三 《诗》学方法论 (211)
 - 四 诗歌发生论 (220)
 - 五 以情论《诗》 (224)
 - 六 六义新论 (229)
 - 七 《诗》学地域文学观 (234)

-
- (242) | **第八章 王柏的《诗》学思想**
- 一 删“淫诗”：《诗》学理学化走向极端 (242)
- 二 《诗疑》的文学思想 (248)
- (260) | **第九章 宋代《诗》学与宋代辞赋批评**
- 一 比、兴与楚辞艺术手法新论 (261)
- 二 《诗》、赋合流与楚辞文体新论 (265)
- 三 《诗》教与屈原新论 (268)
- 四 《诗》教与楚辞新编 (273)
- (276) | **第十章 宋代《诗》学与诗话**
- 一 诗歌发生论 (276)
- 二 以诗看《诗》 (287)
- (313) |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 绪 言

宋代乃“经学变古时代”。^①“变古”是宋代儒家经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变古”是对传统经学目的、内容及方式的巨大变革。经学“变古”思想其来有自，至有宋终于演变成澎湃的学术思潮。宋代经学“变古”的基本内涵是疑古惑经，其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孙明复《寄范天章书》说：

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
(孙)复不佞，游于执事之墙藩者有年矣，执事病注说之乱六经，六经之未明，复亦闻之矣。今执事以内阁之崇，居太学教化之地，是开圣闾幽，芟芜夷乱，兴起斯文之秋也。幸今天下无事，太平既久，鸿儒硕老驾肩而起，此又岂减于汉、魏之诸儒哉！执事亟宜上言天子，广诏天下鸿儒硕老，置于太学，俾之讲求微义，殚精极神，参之古今，覆其归趣，取诸卓识绝见大出于王(弼)、韩(康伯)、左(氏)、穀(梁)、公(羊)、杜(预)、何(休)、毛(萇)、范(宁)、郑(玄)、孔(安国)之右者，重为注解，俾我六经廓然莹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学者庶乎得其门而入也。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220页。

孙明复乃宋初三先生之一。此段话充分说明了宋初学术思想发展的几个基本特点,其一,随国家稳定,武事息而文化建设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其二,旧有的经学注疏已不能适应和满足宋初新的社会形势之要求;其三,突破传统学术束缚,重注儒家经典成为宋初学术发展的迫切需要。孙明复特别希望由皇帝或朝廷来完成六经重注之事,但这样的愿望在当时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如此,孙明复的倡导还是拉开了宋代疑古惑经、重注六经的序幕。钱大昕《孙明复小集序》说:

当宋盛时,谈经者墨守注疏,有记诵而无心得。有志之士,如欧阳氏、二苏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而先生(孙明复)实倡之。观其《上范天章书》,欲召天下鸿儒硕老识见出王、韩、左、穀、公、杜、何、毛、范、郑、孔之右者,重为注解,俾六经靡然莹然,如揭日月,以复虞、夏、商、周之治,其意气可谓壮哉!

在宋代疑古惑经的大潮流中,在经典重注的新学风里,宋代《诗》学领域也呈现出积极的“变古”倾向。宋代《诗》学“变古”主要是针对传统汉唐《诗》学体系而发。皮锡瑞《经学历史》说:

自汉以后,说《诗》皆宗毛、郑。宋欧阳修《本义》始辨毛、郑之失,而断以己意。苏辙《诗传》始以《毛序》不可尽信,止存其首句,而删去其余。南宋郑樵《诗传辨妄》始专攻毛、郑,而极诋《小序》……后(朱熹)见郑樵之书,乃将《大小序》别为一编而辨之,名《诗序辨说》。其《集传》亦不主毛、郑。

因此,以毛、郑为代表的传统《诗》学在宋代成为了“变古”运动的重点革新对象。尤其是《毛诗序》更是成为宋代《诗》学疑古

惑经的焦点。

“变古”思潮无疑是宋代《诗》学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它改变了传统汉唐《诗》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和运作方式,并呈现出新的《诗》学特征。宋代《诗》学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 《诗》学理学化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乃宋代文化的特殊现象。宋代理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无不以儒家经学为基础。通过对儒家经学的重新诠释,理学思想得以发生和进一步发展。《诗》学乃宋代理学思想发生发展的重要领域,因此,宋代《诗》学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发展特征。宋代《诗》学理学化标志着《诗》学发展方向的深刻转变。宋代《诗》学理学化的发展倾向形成甚早,如北宋的二程、张载以及欧阳修等人的《诗》学著述中均不同程度的有所反映。而南宋的朱熹、吕东莱以及杨简等又将宋代《诗》学理学化发展推向高潮。

宋代《诗》学理学化无疑也是“变古”思潮发展的成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慈湖诗传》说:

是书大要本孔子无邪之旨,反复发明。而据《后汉书》之说以《小序》为出自卫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论如谓《左传》不可据;谓《尔雅》亦多误;谓陆德明多好异音;谓郑康成不善属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学》之释《淇澳》为多牵合,而诋子夏为小人儒。盖简之学出陆九渊,故高明之过至于放言自恣,无所畏避。

据此可知,杨简的《慈湖诗传》实乃陆九渊心学与宋代疑古惑经思潮相结合的产物。《慈湖诗传》对先秦两汉的典籍与《诗》说大加批驳,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要把《诗》纳入心学义理之范围。因此,《慈湖诗传》除了强烈的疑古惑经色彩外,理学气息也是十分浓厚的。试看杨简对二《南》的一些解说:“论《关雎》:是诗后妃思得贞静之淑女以事君子。求之之切至于寤寐不忘。猗与至哉!此诚确无伪之心!不忌不妒之心,即道心,即天地之心,鬼神之心,百圣之心。”

“论《兔置》:咏诵《兔置》之诗,不觉起敬起慕,庄肃子谅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所以始,亦不知所以终。道心融融,此人心所同,千古所同,天地四时之所同,鬼神之所同。”

“论《采芣苢》:人感于物而为言为音,无非道者。惟流而入于邪则昏则迷。《采芣苢》,无邪之诗也,无邪则无往而非道。”

“论《汉广》:此不敢犯礼之心,即正心,亦道心,亦天地鬼神之心。”

“论《采蘋》:此供祭祀之心,勤敬之心,即道心,即圣贤之心,即天地鬼神之心。”

“论《殷其雷》:闵其君子勤劳之心自是正心、道心。”

据上可知,“正心”、“道心”等理学性命论范畴成为了杨简《慈湖诗传》论诗的核心内容。杨简曾说“诵咏二《南》之诗,自然道心兴起,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①这充分体现了杨简对二《南》的理学化接受。其实又岂止二《南》呢,整部《诗》都成为了杨简的“道心”生发场。故杨简又说“《三百篇》中,或诵或歌,皆足以兴起人之道心”。^②杨简及其《慈湖诗传》亦只是宋代《诗》学理学化的一个代表。类似的思想与范畴在宋代其他《诗》学著述中屡见不

① 杨简:《慈湖诗传》卷一,四库全书本。

② 杨简:《慈湖诗传》卷一,四库全书本。

鲜。因此,《诗》学理学化成为宋代《诗》学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 《诗》学与文学互动

《诗》本是诗歌,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决定了在历代《诗》学中始终不乏以诗看《诗》的思想产生。虽然《诗》曾长期被奉为神圣的经典,经学《诗》学观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些始终不能抑制《诗》学内部文学思想的产生。在历代《诗》学领域里,经学与文学的两条发展线索始终并行前进。至宋代,随文学观的发展演变,《诗》学文学化倾向又呈现出越来越强烈之趋势。

《诗》学与文学在宋代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诗》学呈现出强烈的文学化色彩;另一方面,文学也呈现出明显的向《诗》靠拢倾向。《诗》学文学化主要表现在用诗歌的文学性质去审视和剖析《诗》,并相应形成一系列文学性《诗》论。例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一说:

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于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

这里,“深于文章”实际上说的就是诗歌的文学艺术特征。显然,张文潜审视与评判《诗》的角度及话语都是文学性质的。又如,陈善《扞虱新话》下集曰:

郑康成注毛诗，牵合《周礼》。沈存中论诗亦有此癖。诗人之语，要是妙思逸兴所寓，固非绳墨度数所能束缚，盖自古如此。予观郑康成注毛诗，乃一一要合《周礼》。《定之方中》云：“騋牝三千。”则云：“国马之制。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国六闲。马四种，千二百九十六匹。卫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马数过制”……如此之类，皆是束缚太过，不知诗人本一时之言，不可一一牵合也。康成盖长于礼学，以礼而言诗，过矣。近世沈存中论诗，亦有此癖，遂谓老杜“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为太细长，而说者辨之曰：“只如杜诗有云：‘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世间岂有万丈城哉？亦言其势如此尔。”予谓周诗云：“崧高维岳，峻极于天。”岳之峻亦岂能极天，所谓不以辞害意者也。

陈善很不赞同郑玄以礼注《诗》，更不满意沈括用礼制来审视唐诗。陈善的主要理由是“诗人之语，要是妙思逸兴所寓，固非绳墨度数所能束缚”。这种认识显然是建立在对诗歌文学艺术本质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陈善认为诗歌的这种本质“盖自古如此”。因此，在陈善看来，《诗》与后世诗歌在文学特质上是一以贯之的。这里，经学与文学的界限已经被打破。《诗》学与诗学已经合二为一。这就是以诗看《诗》。

宋代《诗》学所形成的文学性认识甚多。例如，诗歌发生论、以情论《诗》、以文本论《诗》等等。这些都是《诗》学文学化之表现。而文学《诗》学化则主要表现在宋代文论及文学创作对《诗》之题材、艺术手法以及《诗》学成果等的借鉴与转换。其中又以宋代诗话的《诗》学化表现最为突出。例如，郭思《宋诗话辑佚·瑶溪集》说：

诗之六义，后世赋别为一大文，而比少兴多。诗人之全者，惟杜子美能兼之。如《新月诗》“光细弦欲上，影斜轮未安”，位不正，德不充，风之事也。“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才升便隐，似当日事，比之事也。“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河汉是矣，而关山自凄然，有所感兴也。“庭前有白露”，露是天之恩泽，雅之事。“暗满菊花团”，天之泽止及于庭前之菊，成功之小如此，颂之事。

这里，郭思用《诗》学的“六义”来品评唐诗。这就是宋代诗话的《诗》学化表现。另外，宋代文学作品中也多有借鉴和学习《诗》之题材及艺术表现手法的现象。例如，邵雍《谈诗吟》云：

诗者人之志，非诗志莫传。人和心尽见，天与意相连。论物生新句，评文起雅言。兴来如宿构，未始用雕镌。

这里，邵雍对“志”和“兴”的认识显然直接源于《诗》学。因此，理学家的诗歌创作也有着深厚的经学素养。再看下列宋代诗歌作品的表现：

刘摯《还郭祥正诗卷》云：“李杜久死诗不作，风雅三百年来穷。”

王令《广陵集》卷一《杂诗》云：“《关雎》后之淑，《棫朴》君之明。《兔罟》尚好德，况乃公与卿。所以彼行苇，敦然遂其生。谁能弦此歌？为我发古声。”

陆佃《陶山集》卷一《依韵和毅夫新载梅花》云：“谁赋梅花诗，拟继三百五。”

黄庭坚《山谷集》卷二《次韵答王沓中》云：“我拏二《南》秀，一见空马群。”《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二首》：“短世风惊雨过，成功梦迷酒酣。草元不妨准易，论诗终近《周南》。”